

# 金融危机、收入差距与农村贫困问题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柑橘主产区为例

李志平, 祁春节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任何拉大收入差距的力量都会对农村的贫困产生重大的影响。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多方面影响着我国农民收入差距,有必要采用相应的措施降低它对我国贫困发生和贫困深度的影响。在2008年六省七地的实地调研资料的基础上,采用参数回归、基尼系数等工具,研究拉大农民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而寻找金融危机影响农村贫困的主要方式,并试图提出扼住贫困蔓延的政策建议。研究结论:造成农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有:资本数量、受教育程度、非农收入、是否参加合作社、区域因素等;这些因素对农村的收入分布状况产生独特的影响,对贫困发生和贫困深化的影响方式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政策建议: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促进农村的资本形成;增加就业机会,促进非农收入的增长;加大合作社的培育,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加贫困瞄准的准确度,提高扶贫政策的效率。

**关键词** 金融危机;农村;收入差距;贫困;实证

**中图分类号:**F30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0)03-0030-07

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农村贫困的严重程度,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惊人的。世界银行指出,金融危机已经导致赤贫线以下的人口增加了2亿人,婴儿死亡每年新增20~40万人,包括中国在内的107个发展中国家高度暴露在危机导致贫困增加的风险面前<sup>[1]</sup>。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甚至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能破坏联合国为世界贫困和饥饿人口所作的一切努力。在中国,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贫困地区的影响逐步显现,出现了农民工提前返乡比例大,农民收入受影响大,优势产业受冲击大和扶贫龙头企业困难等突出问题。考虑贫困的自我繁殖和家庭因素,美国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的贫困剧增状况,可能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在这种情况下,分析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农村贫困的影响途径、方法,并寻找应对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一、文献综述

一个地区的贫困发生往往与过大的收入差距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指出:收入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严重,财富日益向少数人集中,都会

恶化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阿玛蒂亚·森提到,在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即使我们的世界出现空前的繁荣,一些人也是极端贫困的”。另外,菲利普·拉弗等<sup>[2]</sup>认为,收入不平等将减少当地的经济增长,而世界银行早在2006年的《世界经济报告》中明确表示,公平是一个地区发展重要的影响因素,收入差距过大还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进而减少经济的产出总量,更加剧了贫困发生。

我国农村地区存在多种加剧贫富悬殊的因素。辛翔飞<sup>[3]</sup>认为工资性收入(或者非农收入)是影响农村内部收入及其差距的重要原因。而关锐捷等<sup>[4]</sup>观察到,区域因素不能忽视,中国农村区域间的家庭人均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在加重。李实等<sup>[5]</sup>指出,农村的乡镇企业是拉开农村区域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另外,基础设施的差别在农村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高梦滔<sup>[6]</sup>在拉大收入差距的因素中考虑到性别平等因素。陈前恒<sup>[7]</sup>也发现,在发展性扶贫项目中,固定资产多的农民、曾经做过干部或者正在做村干部的人可以大概率地获得扶贫项目,而外出打工、家里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则几乎不可能获得这些项目。以此类推,扶贫项目越多、越大,可能反

收稿日期:2010-03-18

\*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09YJC790108)。

作者简介:李志平(1970-),男,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E-mail:hebeili@mail.hzau.edu.cn

而远离贫困减少的目的,增加了农村的收入差距。

另外,我国农村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农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第一是城市逐利资本与农村流转的土地相结合后,农村已经或者即将出现可能有损于农民利益的区域垄断性农业企业;第二是农民对外部资源的无动于衷;第三是相当一些地区的区域发展能力不强,无法让外部资源惠及全体人民(尤其是贫困农民的社会资源),只能形成这样或者那样的、零星分布的“高地”或者“洼地”,人为推高了农村的收入差距,从而加剧了这些地区的贫困程度。

在新旧农村收入差距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随着金融危机逐步向农村扩张,必然对我国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而影响我国的农村贫困。加速我国农村转危为机的进程,有必要通过收入差距这个中间变量实证刻画金融危机与农村贫困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而辅助以合宜的、精确的应对政策。基于以上研究和2008年六省七地的实地调研资料,拟采用参数回归、基尼系数等工具对农村收入差距进行研究,试图找到金融危机影响当前农民收入分配的因素,并提出减少贫困的政策建议。

## 二、模型

以农民家庭为单位(下文简称农户),分析其增加收入的途径,构筑一个估算农村收入高低的模型。然后再构造一个简易的基尼系数的计算模型,度量农村的收入差距或者是农村的收入分配状况。

### 1. 农户收入的测算

一般而言,农户的收入可以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两个部分,即:

$$TI_i = NAI_i + AI_i \quad (1)$$

$TI_i$ 为该农户的总收入, $NAI_i$ 是该农户的非农收入(即总收入中减去务农收入的哪一部分收入), $AI_i$ 是该农户的务农收入(主要是指农户的农业收入),再考虑单个农户一般无力也不愿意改变农村的农产品价格,因此对农村的任何一个农户而言,农户的务农收入就与农产品产量呈正相关关系,进而使用(2)式对农户的务农收入进行描述:

$$AI_i = AI_i(N_i, K_i, EDU_i, MG_i, AG_i, IB_i) \quad (2)$$

在(2)式中,各个变量做出如下假设: $N_i$ 是该农户的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口多,一方面可能会增加在农田中的劳动投入数量,另一方面,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约束下,多人口家庭往往也意味着该家庭

承包的土地较多,这些家庭的农业生产具有较大的规模经济,农业总产量和农业单产也应该比较大,务农收入也相应增加; $K_i$ 是生产中的资本投入(农药、化肥、种子、固定设施的分摊等),资本是农户生产中主要的投入要素。考虑到农村普遍存在资金匮乏,农业生产中的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不可能为负数,所以,增加资本就会增加该农户的农产品产量,进而增加他们的收入水平。 $EDU_i$ 是受教育程度,文盲为1,小学为2,初中为3,高中为4,其它为5。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收入也越高。 $MG_i$ 是该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情况,加入取1,不加入取0,由于加入合作组织,可以分享合作规模经济的好处,同时降低固定成本的支付水平,因此加入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提高农户收入水平。 $AG_i$ 是该农户的主要劳动力的年龄,美国2002年的《农户法案》中特别提到青年农民的弱势地位,需要外部力量的帮助,但是考虑到年龄太大时,年老力衰,势必影响劳动投入的产出效率和收入水平,另外,年纪大的人也不大有可能方便使用现代的技术手段,比如电子商务。不妨先假定:农户主要劳动力年龄偏高,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收入就会降低。 $IB_i$ 用来分析地域因素,沿海等发达地区取1,中部地区取2,其它地区取3。

虽然(2)式的展开有多种表达方式可以使用,但考虑到这些表达方式的可比性和普遍性,本文选用扩展的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而将它两边取对数后展开,并结合(1)式得到:

$$\ln TI_i = \alpha_1 + \alpha_2 \ln K_i + \alpha_3 NAI_i + \alpha_4 H_i + \alpha_5 EDU_i + \alpha_6 MG_i + \alpha_7 AG_i + \alpha_8 IB_i \quad (3)$$

### 2. 简易基尼系数的构造及其效应分析

世界各国广泛使用基尼系数度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如果收集到一个地区的收入分配数据,记最低收入端人口份额为 $p_i$ ,记这一群体拥有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为 $L_i$ ,以 $p_i$ 为横坐标,以 $L_i$ 为纵坐标,将这些点联接起来就得到近似的洛伦兹曲线。这条曲线的位置越高,即洛伦兹曲线与横坐标之间的面积( $B$ )越大,各个低收入端群体拥有的收入份额越大,收入分配越平等。基尼系数定义为: $GINI = (0.5 - B)/0.5$ ,其数值越大,收入差距的程度越严重。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就是太高了<sup>[8]</sup>。

然而,从不同角度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差别较大,而且由于模型的假设不同,研究成果的可重复性不强<sup>[10]</sup>,计算分组也会遗漏一些信息,比如取2000~2500元的分组,就无法观察组内农村之间

的收入变动,另外也便于一般读者对农村不平衡的进一步关注,设计了一个只需要普通 EXCEL 加减乘除就可以自我完成的计算公式,设计原理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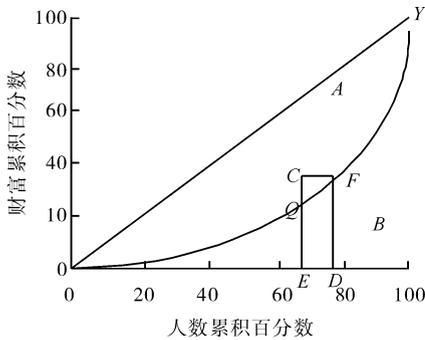


图 1 基尼系数的简易计算

B 的面积计算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计算小矩形的面积(比如矩形 CEDF),然后再减去进入 A 部分的小三角形(比如 CFQ)的面积,最后将剩余的梯形面积加总求和;第二种方法是直接计算小梯形的面积。本文采用第一种方法,得到公式(4):

$$GINI = [0.5 - \sum (\sum TI_i / TTI - 0.5 \times TI_i) \times (TI_i / TTI)] / 0.5 \quad (4)$$

在(4)式,在  $\sum TI_i / TTI$  中,  $TI_i$  是从小到大排列的第  $i$  个农户的收入,  $\sum TI_i$  是从最低收入的农户到第  $i$  个农户的收入加总,  $TTI$  是所在群体的总收入,两者相除( $\sum TI_i / TTI$ )是收入的累积百分数,  $\sum TI_i / TTI$  与  $TI_i / TTI$  相乘得到一个小矩形面积,  $0.5 \times TI_i \times (TI_i / TTI)$  是小三角形的面积。  $\sum (\sum TI_i / TTI - 0.5 \times TI_i) \times (TI_i / TTI)$  近似表示 B 的面积。在这里,  $TI_i / TTI$  正好等于  $(1/n)$ 。

又据 Dagum 的研究,如果一个群体基尼系数、人口比例、收入比例和平均收入水平分别用符合  $G$ 、 $P$ 、 $S$ 、 $U$  表示,其两个部门分别用下标 1 和 2 进行区分,则有如下关系:

$$GINI \geq P_1 S_1 G_1 + P_2 S_2 G_2 + (P_1 S_2 + P_2 S_1) |U_1 - U_2| / (U_1 + U_2) \quad (5)$$

从(5)式中可以分为两段,前段  $P_1 S_1 G_1 + P_2 S_2 G_2$  表示在后段  $U_1$  和  $U_2$  基本保持不变时,可以近似分析  $G_1$  和  $G_2$  对总的基尼系数的影响,不妨称之为扩散效应,同理,  $U_1$  和  $U_2$  的变化对总基尼系数的影响,称之为结构效应。

### 三、数据与检验

#### 1. 数据与性质

样本来自中国创新体系(柑橘)2008 年的

调研材料。调查指标主要包括农户的基本情况(收入结构、家庭人口、非柑橘用地等)、柑橘生产的成本收益、技术选择、销售渠道和合作机制等五个方面。调查采用面对面的访谈方式,共得到 112 份调研表,其中有效的样本数 90 份。样本橘农主要分布在浙江台州、湖北丹江口、湖北当阳、湖北宜昌龙泉、广东四会、广西桂林、江西南丰、重庆等地区,这些地区均是中国柑橘主产区。根据柑橘产业内部的划分,浙江、广东、广西为第一产业带,江西为第二产业带,湖北重庆为第三产业带,三个产业带分别表示为 I、II、III。相对于时间序列数据,价格因素对方程的影响力较弱,而且价格的变化同时表现在方程的左右两边,另外,在当前农村供给农产品的农户数量和购买农产品的小商小贩的数量都比较多,农户基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因此,对一个地区内部的农户群体而言,价格变化对农户收入差距的收入影响就比较小(相比影响产量而言),下面的分析中就忽略价格变化对农民收入差距和贫困的影响。

#### 2. 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

将方程(3)扩展为计量方程:

$$\ln TI_i = \alpha_1 + \alpha_2 \ln K_i + \alpha_3 NAI_i + \alpha_4 H_i + \alpha_5 EDU_i + \alpha_6 MG_i + \alpha_7 AG_i + \alpha_8 IB_i + \epsilon \quad (6)$$

在(6)式中,  $\epsilon$  为符合均值为零的正态分布。首先采用最小二乘估计进行逐步回归,然后使用 WITTE(有交叉项)异方差检验,对方程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1。

在表 1 中,在所有模型中,系数的符号都符合假定,而且资本、非农收入、区域因素和教育因素均在 5% 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认为它们是当今富裕农户的致富的主要依靠,换句话说就是它们是拉大农村收入差距的主要致因。显然,如果金融危机使农村的资本减少 1%,产量大约就下降 0.63%。从模型 5 和模型 6 的对比中,模型中分布包含教育和合作组织这两个变量时,都通过了 5% 的统计检验,但是放在同一个模型中后,教育变量更为显著,虽然本文无意于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不能忽视合作组织影响农村收入差距的作用。在模型 3 中,家庭规模与收入呈现一个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村土地面积与人口数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但是结合其它要素后,由于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农户的家庭规模对收入的影响就微不足道了,理由可能是,农户的家庭规模大,人均教育支出就较少,家庭教育支出可能抵消了经营中的规

表1 回归方程

模型(lnTI)	lnK	NAI	YH1	EDU	MG	H	AG	C	R2	AR2	DW	F
1	0.79 (15.65)							-5.83 (-12.01)	0.74	0.73	2.33	245
2	0.73 (15.52)	0.08 (-4.67)						-5.38 (-12.04)	0.79	0.78	2.32	162
3						0.24 (3.11)	-0.28 (-1.3)	1.21 (2.10)	0.11	0.09	1.41	5.4
4	0.68 (13.68)	0.08 (4.81)	0.26 (2.28)					-5.2 (-12.02)	0.8	0.79	2.31	115
5	0.67 (14.33)	0.07 (4.25)	0.27 (2.52)	0.41 (3.88)				-5.17 (-12.2)	0.83	0.82	2.23	104
6	0.64 (12.31)	0.08 (4.73)	0.26 (2.13)		0.25 (2.22)			-4.80 (-12.2)	0.81	0.80	2.33	92
7	0.64 (13.05)	0.07 (4.24)	0.25 (2.39)	0.36 (3.47)	0.17 (1.52)			-4.57 (-11.3)	0.84	0.83	2.23	85
8	0.64 (13.03)	0.06 (3.76)	0.25 (2.36)	0.34 (3.13)	0.16 (1.49)	0.05 (1.06)		-5.12 (-11.3)	0.84	0.83	2.23	72
9	0.63 (12.34)	0.06 (3.77)	0.26 (2.36)	0.32 (2.77)	0.17 (1.53)	0.05 (1.29)	-0.05 (-0.4)	-4.98 (-8.65)	0.84	0.83	2.24	61

模经济。而年龄因素的系数没有通过5%的统计检验,说明它不是收入多寡的主要决定变量。从此可以看出,农户的“退休年龄”似乎可以更早些。

### 3. 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对农村收入分布的影响

为了更清楚了解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对农村收入分布的影响,首先根据这些变量的特征进行分组,然后根据基尼计算公式(4)计算出各组的基尼系数和收入均值,再借助公式(5)分析农户收入分布的变化(计算结果见表2)。

表2 主要致因对农村收入不平衡影响

科目	户均收入	基尼系数	排序
全部样本	11.29	0.622	12
是否加入合作社	加入	19.12	0.587
	不加入	4.01	0.336
地域因素*	沿海	16.88	0.603
	中部	3.50	0.260
	其它	5.28	0.504
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上	25.82	0.615
	初中及以下	7.82	0.531
非农收入	有	11.09	0.617
	无	11.50	0.612
资本数量	大于均值	35.21	0.435
	小于均值	4.89	0.372

\* 沿海指的是浙江、广东、广西,中部指的是江西;其它地区指的是湖北、重庆。

从表2中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第一,农户之间收入分配不平衡。当今农户之间(本文是柑橘产业)的收入分配颇不平衡,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622,远远大于官方统计的中国农村的0.39和中国整体的0.45。事实上,在农户层面上,最高与最低的种植户的柑橘产值之比达到了

将近120倍。另外,从分组的情况看,收入高的组比收入低的组的基尼系数都高,就连具有扶贫开发性质的合作社也是如此,加入合作社的部门的基尼系数几乎是没加入部分的两倍,但是每个致因的扩散效应和结构效应都不同(见表2中的排序)。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危机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二,合作社对农村的收入分布状况影响较大。从是否加入合作社的角度看,加入合作社后,基尼系数达到了0.587,远远大于没有加入团体的0.336,可以通过扩散效应,减少合作社内部的基尼系数。所以,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在合作社等组织内部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降低合作社内部的基尼系数,是减少金融危机下的贫困增长的有效手段。

第三,区域因素在农村的贫困和收入差距领域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地域因素看,中部(江西省)的基尼系数最小,只有0.260。这与王祖祥<sup>[8]</sup>的结论基本一致。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江西等中部地区对金融危机的贫困抵御能力较强。另外,沿海产业带由于包含了地处西部的广西,这也是其基尼系数加大的一个原因。

第四,教育对农村的收入分布影响过程较为复杂。从教育要素看,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基尼系数为0.615,而初中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基尼系数为0.531。两者的差距不大,结构效应比较小。这说明在 $|U_1 - U_2|$ 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增加高中及以下的受教育程度,显然并不能够保证降低农村的不平衡程度,可能还有恶化的可能。退一步讲,即使通过教

育可以熨平当前的农村不平衡程度,但是会消耗更多的时间,如果再考虑农村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极少,那么高中及以上就是一个从受教育程度看非常同质的群体,但基尼系数也大大超过了 0.4,因此在其它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即使普及了高中阶段的教育,也不会显著缓解目前日益恶化的农村不平衡程度。因此,短时间内正规教育对农村的收入差距影响较小。反过来,结合上面农村收入的影响因素的结论(教育水平是显著增加农村收入的变量),农村培训可能是同时兼顾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村收入分布状况的因素。

第五,市场化的非农收入不可能有效改善农村的收入分配状况。从非农收入的要素看,有无非农收入的两个群体的基尼系数近似相等,结构效应不十分明显,这说明在扩散效应变化不大(本文的计算结果是 $|U_1 - U_2| = 0$ )的情况下通过增加非农收入降低不平等程度的政策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由于本文没有对非农收入进行进一步的区分,无法对人口城乡流动、乡镇企业就业、公务员种植户等各自对基尼系数的影响进行研究,因此也就无法地当前农村地区大力推动的人口城乡流动对农村基尼系数的影响进行验证,但在金融危机逐渐向农村推进的时间段内,工业部门的就业环境日益恶化,采用传统的方式增加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大力推动人口城乡流动的成本越来越大,虽然能够增加非农收入,但是改善农村的收入分布效果却有可能不大。

第六,资本要素对增加农户的收入和改善农村的收入分布状况都具有良好的性质。资本富裕群体与资本贫乏群体各自的基尼系数相差不大。再根据表 2,资本对产出的贡献是显著的,因此资本富裕群体的平均收入要大于资本贫乏部分,依次推论,在增加农村金融供给(比如增加农村小型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质量,加快农民的征信和授信规模)的同时,大力推进农村的金融深化,创新增加农村资本形成的金融工具,增加农民金融的实际使用量,增加平均资本的数量,可以显著增加平均产出的水平,增加资本贫乏者的资本供给水平,降低农村的资本使用成本,进而达到同时增加农户收入和改善农村收入分布的效果,显然,这应该成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及其日后较长时间农村发展的一个重点。

#### 四、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对农村贫困深度的影响

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如果施行一项反贫困政

策或者其它政策,可以减少农村总贫困人口的数量,但这种减少是以农村中最贫困群体的生活更加艰难为代价,比如一项旨在 99% 的农民的收入至少保持不变,而最穷的 1% 的收入下降一倍,则这些政策就应该受到谴责。所以,前面的研究影响农村收入差距的因素对农户收入和农村收入分布的因素和作用方式,还不足以对农村的贫困进行全面的描述,还必须考虑它们对贫困深度的影响,因为这些因素对农村的一般贫困和深度贫困的影响并非总是具有相等的力量,有的时候,两者还出现相反的情况。本文将收入最后 10% (检验贫困发生的特征) 和最后 5% (检验贫困深度的特征) 的农户挑选出来,观察他们与其它部门在各个特征上的差别,以便了解贫困发生与贫困深化的关系;然后创造一个虚拟变量  $PK$  (贫困者取值为 1, 其它取值为 0), 仍然借助 Eviews3.1 软件中的 OLS 回归分析工具,寻找对收入差距因素对贫困程度的影响信息。

##### 1. 对农村种植户贫困的发生及其深度的影响

根据贫困的相关理论,贫困一般发生在收入最低的 10% 之中,因此以农户内的人均收入为基本分析指标,分析在农民个人层面上的最低收入的 10% 农户的基本特征。另外,对收入最后的 5% 做为贫困深度的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得到表 3。

表 3 农村种植户的贫困特征

贫困线的选择 与对等部分	人均收入 的最后 5%	其它 95%	人均收入 的最后 10%	其它 90%
平均受教育程度	2.60	2.87	2.67	2.82
是否有非农收入	0.00	0.52	0.20	0.80
是否加入合作社	0.4	0.47	0.44	0.47
家庭人口(个)	4.44	4.33	4.67	4.30
平均年龄(岁)	44.20	48.87	47.01	48.79
区域变量	2.20	1.73	2.56	1.67
分组平均资本(万)	0.45	3.19	0.64	3.30

注:人均收入是该户收入除以人数;平均受教育程度:小学以下、小学、初中、高中、高中以上分别取值 1、2、3、4、5。是否加入合作社,加入为 1,不加入为 0;是否有非农收入,有为 1,没有为 0。表内数据由笔者根据调研资料整理。区域值是第一产业带取 1,第二产业带取 2,第三产业带取 3;分组平均资本是贫困组与非贫困组的资本平均值。

在表 3 中,可以看出:人均受教育程度普遍小于其它农民或者农户,贫困者与非贫困者相差 1 年左右的教育时间;是否“有非农收入”这个变量则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在人均收入的层面上,非农收入的增加是减少贫困的基本力量,特别是在贫困程度深的 5%,事实上,所有赤贫(陷入最贫困 5%)的家庭,其非农收入为 0,这充分说明非农收入对赤贫人口的重要性;从是否加入合作社的因素看,贫困者或者贫

贫困户参与合作社的比例较少,参与不足,考虑到贫困者多缺少参与社会活动的资格和资源,参与不足符合传统理论的预测;从家庭人口因素看,贫困发生和贫困发生深度都表示家庭人口过多是重要的贫困致因;平均年龄的数据同样显示出与家庭人口一样的规律,贫困者和贫困户在人均层面上是小于非贫困者或贫困户;区域值显示出贫困发生多在靠近第三产业带的地域,无论贫困发生还是贫困深化都一样;平均资本的数据显示,贫困总是与资本不足相互联

$$PK = -0.38 - 0.055EDU - 0.19NAID + 0.06MG + 0.03H + 0.0044AG + 0.129IB - 8.75 * 10^7 K$$

$$(-1.31) \quad (-0.14) \quad (-2.78) \quad (0.85) \quad (1.47) \quad (0.96) \quad (3.36) \quad (-1.17)$$

$$R^2 = 0.2 \quad F = 2.9$$

从(7)式中, $R^2 = 0.2$ 表明模型中很大一部分方差还没有被解释,但是它可以显示出如下的信息:区域因素和非农收入对贫困发生的作用是显著的,其中区域因素是贫困影响的重要因素,而非农收入的增加对解决贫困问题的作用也显著的,增加非农收入的1个单位,贫困发生就会减少19%的概率,但需要关注其对贫困深度的影响;家庭规模扩大一个人,那么他的家庭的贫困发生概率就增加3%;教育和资本对贫困发生的影响还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但贫困多发生在教育水平低下、资本贫乏的家庭;而年龄与合作社因素与传统理论不符,这可能因为柑橘生产是一个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产业,年龄大反而具有经验而增加了收入水平,贫困者加入合作社虽然享受了一些分工的好处,但同时也增加了一些进入成本,收益与成本相差无几,与其它手段相比较,加入合作社对贫困发生的影响不明显。

##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在2008年六省七地的实地调研资料的基础上,采用参数回归、基尼系数等工具,对农村收入差距的进行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拉大农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有:资本数量、受教育程度、非农收入、是否参加合作社、区域因素等;(2)以上因素也影响农村收入分布状况,无论从那个角度分组,组内的收入差距都过大。以合作社内部、东部地区、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以及非农收入较多的群体更为显著。总的说来,除了非农收入的有无对结构效应的影响不大外,地域因素、是否加入合作社、是否接受高中以上的教育、拥有金融便利与否都具有明显的结构效应;(3)以上因素对贫困发生和贫困深化的影响方式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尽管是否有非农收入、平均受教育程度、是否加入合作社、家庭人口、平均年龄、

系,最穷人们的人均资本大约相差只有其它人们的六分之一,资本缺乏与贫困发生和贫困深化均具有相关性。

### 2. 对贫困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为了更精确描述这些因素对贫困发生和贫困深度的影响,继续进行计量分析。为此,将PK做为因变量,非农收入(NAID)、区域因素(IB)、受教育程度(EDU)、合作参与(MG)、家庭规模(H)、户主年龄(AG)、资本(K)进行回归分析,得到(7)式。

区域、平均资本对贫困发生和贫困深化的效应是一致的,且贫困者内部和贫困群体都具有平均年龄大、属于中西部地区、缺乏组织活动、受教育程度低等共同特点,但非农收入、家庭规模和地区差异不应该被忽视。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减少贫困的政策建议:

#### 1. 大力推进农村金融深化,增加农村资金的有效供给,降低农村的信用贫困

由于资本对增加农户的收入、改善农村收入分布状况都有良好的性质,而金融危机毕竟是“金融”的危机(在中国没有明显的经济危机的迹象),是“信用”的危机。因此,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反贫困政策应该是金融侧重的政策,具体包括:一是增加农村金融机构(含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质量,改善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状态,提高农村金融的有效供给能力;二是创新适合农村的金融工具,如创新诸如股份共享、小产权资产抵押贷款等,增加农户的信用,增加转危为机的力量;三是规范农村的金融生态环境,豁免非农产业的债务,减少通货膨胀和倾斜投资造成的“劫贫济富”。

#### 2. 通过产业调整,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

首先,认真落实产业振兴方案,在增加抗击金融风险能力的同时,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在保就业中促发展;其次,大力推进环保产业和生态环境保护、旅游和运输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金融危机下新的“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出路;最后,给予农村消费帮助,发展消费产业,避免“家电下乡”形成“家电害乡”,减少“丰裕中的贫困”。

#### 3. 创新扶贫开发的方法和措施,提高贫困的瞄准精度

因为区域因素一直是农村收入差距、贫困、贫困

深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地区倾向的、项目支撑的扶贫开发仍然会发生巨大的作用,但要创新扶贫开发的方式,增添新的内容:一是增加对贫困深度倾斜程度,尤其关注平均年龄大、缺乏组织活动、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户特征;二是增加扶贫的维度,要考虑权利贫困和信用贫困等新的贫困类型;三是建设农村贫困的动态调控的网络平台,方便及时采取扶贫政策,提高扶贫政策的效率。

#### 4. 完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功能和机制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民互帮互助方面、在缓解“小农户、大市场”方面、在防治垄断剥夺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在杜绝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嫌贫爱富现象和加大合作社内部的收入再分配的同时,首先要对合作经济组织给以制度和财政上的支持,尤其在涉农补贴、场地占有、品牌申报、出口退税等方面要倾斜;其次是要增加对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成员的培训,增加其市场驾驭能力;最后是要对合作经济组织松绑,地方政府官员兼职理事长,或者直接指派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领导人的做法,可能会

导致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

### 参 考 文 献

- [1] 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报告[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 [2] [美] 菲利普·拉弗. 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链接: 两极分化、政治决策与财产权[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8(3): 1-9.
- [3] 辛翔飞. 中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及其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8(2): 40-52.
- [4] 关锐捷, 郭建军. “九五”期间中国农民收入状况实证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01(7): 2-11.
- [5] 李实, 赵人伟, 张平. 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收入分配变动[J]. 管理世界, 1998(1): 43-56.
- [6] 高梦滔. 西方经济学界对于性别视角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研究评述[J]. 中国人口科学, 2005(2): 81-89.
- [7] 陈前恒. 农户动员与贫困村内部发展性扶贫项目分配[J]. 中国农村经济, 2008(3): 42-48.
- [8] 王祖祥. 中部六省基尼系数的估算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4): 77-87.
- [9] 鲁晓东. 收入分配、有效要素禀赋与贸易开放度[J].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 2008(4): 53-64.

## Empirical Study on Financial Crisis and Anti-poverty

—A Case of Citrus' Main Growing Areas in China

LI Zhi-ping, QI Chun-jie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As the income growth of farmers is slow, any powers including financial crisis to widen income disparity can have great effect on rural poverty. Based on household—level survey, the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crisis, income disparity and the prevention of spread of poverty in Chinese rural area by ways of parameter regression, Gini coefficient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come disparity is caused by finance, education, non—agriculture income, cooperative participating and region diversity; while they have different effect on the enlargement of disparity and worsening poverty in various ways. So the prevention of the worsening poverty should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se factors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Key words** financial crisis; rural area; income disparity; poverty; empirical

(责任编辑: 金会平)